

民为邦本：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 刘余莉 申静思

“民为邦本”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原写作“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书中记载，禹的孙子、启的儿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恨，但他却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都城，国民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即后羿）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困境，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其中第一个弟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虞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时就有所谋划。我治理亿万民众，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怎么能够不谨慎恭敬呢？

《尚书》中的这种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早在《周易》之中，就已经出现了与此一致的思想。《易·剥》：“《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山本是高起于地面，却由于下不厚而颠下，附着于地，这是圯剥之象。圯剥必然是从根基开始，下剥则上危。为政者通过圯剥之象反思施政，那么在治理时就应当“厚下”，厚恩加于百姓，以求得

“安宅”。山附于地就是孟子所谓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也就是《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故厚下乃可安宅，此救剥之妙策也。民是社会的基石，以民为本则民足，民足则社会的基石就稳固，社会的发展才有了保证。

历史的发展验证了“民为邦本”历史规律。例如，《群书治要·魏志下》记载：夏商周历经数十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可见：“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这说明，在位者、执政者对待人民、百姓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密切关系。正如《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所总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经济上富民，政治上重民，文化上教民。

关于经济上富民，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以及“庶之”“富之”“教之”的经济发展“三步曲”论述说明，孔子从不否认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正当追求，并认为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水平是实施良好有效的道德教化的基础。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

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管子也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所以治国首先应该从经济上富民。

关于从政治上重民，在《群书治要·六韬》中记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兄长友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在位者从政治上重民主要表现在必须重视倾听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代圣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之语：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关于文化上教民，《群书治要·管子》中曾言：“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关于教育的目的和核心，《礼

记·学记》中言，“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即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因此，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同时具备“君”“亲”“师”三个职能。这意味着在位者不仅仅要管理率领民众，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般爱民众。除此之外，还要教导民众做人的道理。这些才是真正的利人之道。

《群书治要·晏子》中记载，齐景公曾问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回答说：首先要明确教义和政令，并且自己率先履行；对待人民不用苛政，而以刑罚来防止犯罪；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须先做到；禁止百姓去做的，自己一定不能违反，这样，人们才会服从其教诲。所以，教民要求领导者和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古代四书五经等经典都是针对领导者的教诲。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言：“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如果为官者认为需要教化的是百姓，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结果势必会导致“言教者讼”，达不到教育的效果。



（上接1版）

推动高质量发展，教育是根本。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聚焦“培养什么人”，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省建设，在全国率先开展德育铸魂、智育提质、体教融合、美育熏陶、劳动促进行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聚焦“怎样培养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推动全省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聚焦“为谁培养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安徽现代化建设增强智力支撑。

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安徽拥有一批大院大所大校，更多领域科技创新实现“并跑领跑”。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施科技创新“栽树工程”，打造“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健全国家实验室服务保障机制，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布局建设12个大科学装置形成集中区，区域创新能力连续10年居全国前列。面向经济主战场，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和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建设。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扩容升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主动承接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服务国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更多制造业揭榜攻关项目打破国外垄断。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大力发展民生科技，托珠单抗诊疗方案、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等安徽“药方”助力全国抗疫，重组蛋白疫苗为全球1亿多人提供健康保护。

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没有人才优势就没有创新优势、发展优势，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抓实“育才”，完善优秀青年人才全链条培养制度，全方位扩容升级就业、生活、租房、社保、创业培训等方面政策举措。抓实“引才”，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推进合肥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抓实“用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赋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和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抓实“评才”，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全省人才总量在1000万人基础上扩容提质。

准确把握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找准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奋斗目标。

高质量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才有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我们要深刻认识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确保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惠民生，继续实施33项民生工程，连续多年新增财力8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暖民心，集中拿出150亿元，实施就业促进、新徽菜·名徽厨、老年助餐服务、健康口腔、安心托幼、快乐健身等10项暖民心行动；累计将投入200亿元，实施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解决3000多万群众饮水安全问题，让政府“干的事”精准对接群众“盼的事”。

高质量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才有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我们要深刻认识人民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站稳人民立场，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握人民愿望，实施基层党建重点考核访工作制度，以更大力度开展信访事项化解攻坚。尊重人民创造，挖掘运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总结推广农业生产“大托管”“小田并大田”“四事四权”等基层经验并上升为政策举措。集中人民智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高质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才有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安徽建设，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全省空气、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让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可持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施城乡居民收入10年倍增计划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让人民群众安全感更有保障，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平安建设连续10年保持全国前列，全省上下经济环境平稳健康、政治环境风清气正、社会环境长期稳定。

顾祖禹与《读史方輿纪要》

□ 孙庆峰 黄曙霞

顾祖禹（1631—1692年），字端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后徙常熟，世称宛溪先生。其所著《读史方輿纪要》（以下简称《纪要》）问世后，受到广泛重视，时人将之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抄》合称三大奇书。

三十余年著一书

顾祖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顾柔谦精通历史地理，是当时有名的方輿（地理）学家。从小跟父亲耳濡目染，顾祖禹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顾柔谦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认为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错讹是明朝当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立志写一本实用的军事地理著作，但因国家灭亡悲愤过度，以致身患重病，临终嘱咐顾祖禹完成遗愿。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顾祖禹开始撰写《读史方輿纪要》。当时他的家境非常贫寒，为了写作，顾祖禹不得不紧衣缩食，积攒钱财来买书。买不到的书，他便四处去借，借后抄写，抄完奉还。他订有严格的写作计划，每天必写数个条目，数十年如一日，“穷年累月，屹屹不休”。

为写好《纪要》，顾祖禹广泛收集材料，力求竭泽而渔，不遗漏每一个可以获得的材料。他治学严谨，对收集到的材料，都进行严格辨析与考证，确定无误后才采用。

除利用文献资料，顾祖禹还坚持实地考察，将纸上材料与亲身观察相结合。他广泛游历东南诸省，沿途考察城郭、山岳、河流、道路、关口，与商人、工匠、农民等深入交谈，访寻当地风土人情。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祖禹终于完成《纪要》撰写，此时他已年近五十，距离开始写作已过去二十年。此后岁月中，他一直从事《纪要》修订工作，直到去世前仍在修改，用三十余年的光阴写出了一部地理学巨著。

万里河山藏卷中

《纪要》重点阐述历代行政区划沿革、山川险要、攻防利害，兼论历代战事的得失成败，是一部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融为一体的专著。全书将史事与地理相互印证，“以古今之方輿，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輿。”通过分析地理形势，进而更深入理解历史重大事件；通过考证历史重大事件，以便全面认知地理形势，

因此顾祖禹将书名命名为《读史方輿纪要》。

《纪要》全书一百三十卷，合计二百八十余万字。按照内容可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一是历代州域形势，共九卷。从上古唐虞夏商周开始，一直叙述到明朝。每一个朝代都分析重大军事活动的攻守形势，论述区划设置沿革，让读者对形势的轻重、区划的变动了然于心。如晋代一卷，先叙述魏灭蜀、晋灭吴、永嘉之乱、十六国争斗等战争的军事地理形势，后论述晋代行政区划。

二是分省介绍，共一百一十四卷。按照明代行政区划，分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依次论述。每一省又按府、州、县顺序分别列举，叙述地理方位、战略地位、建制沿革、名山大川、历史重大战役等。如北直隶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区），顾祖禹先指出它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京师的咽喉所在，“枕负居庸，处喉吭之间，司门户之寄，京师大命尝系于此”。接着详细论述昌平的军都城、万年城、巩华城、居庸关、白杨口、苏家口等战略要地，以及天寿山、军都山、白浮山、银山、榆河、官河、高粱河等山川险要。

三是山脉河流，共六卷。这一部分主要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境内太行山、大别山、岷山等主要山脉，以及黄河、长江、淮河、汉水等主要河流。通过山川河流的纵横交错，展示中国地理的经络。

四是星宿分野，共一卷，记叙历代关于天上星区与地理区域对应之说，阐释天文与地理的相互关系。

最后附有图表，计有全国、各省、边疆要塞、黄河、海运、漕运等地图二十余幅。

匠心独具的地理学著作

鲜明的军事色彩是《纪要》的重要特点。全书着眼于国防需要，详细论述地理形势、山川险易、军事要塞，对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则简略叙述。每一省卷首撰有总叙，概论地理形势，同时引用大量战争史实，以展现成败之关键。每府、州、县同样是这种体例，但论述内容更为详细。

以南直隶（区划范围约为今江苏、安徽）为例，顾祖禹指出：“明初规画畿辅，跨江踰淮，幅员最广，夫亦保江者不在江南，保淮者不在淮南之意乎？”并引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保江南必须保淮南，江南淮南唇齿相依，没淮南则江南也难保。后世

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兴起，定都天京（今南京），占据江南，但未全力争夺淮南，导致后期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防守局面。清军后在南京北建江北大营，在南京城外建江南大营，对太平天国都城夹击之势。而江北大营的选址地扬州、江南大营的选址地紫金山，顾祖禹在《纪要》中早已指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纪要》引宋代学者王应麟之语：“扬州俯江瀕，瞰京口，南瞰钜海之浒，北压长淮之流。”点出扬州对于江南的重要性。又引南朝刘宋时书籍《丹阳记》指出：“京师（今南京）南并连岭，而蒋山（紫金山别名）岩峭巖峻，实作扬州（南京当时属扬州）之镇。”点明紫金山作为南京城外战略高地的重要地位。

区划沿革的详细考证是《纪要》另一个鲜明特点。中国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往往局限于一朝一代的区划变革，而《纪要》则对四千余年区划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尤其对县域的分合、地名的变更、江河湖泊的变迁等进行了重点考证。以山东省无棣县为例，《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只说：“隋开皇六年（586年）分阳信、饶安二县地置，治所在今河北盐山县旧庆云东南。”没有指出无棣县名的渊源。《纪要》则说：“无棣沟，在县南。相传春秋时即有此沟，分大河支流东注于海。隋开皇中因以名县，大业末沟新填废。”两书相比，《纪要》点出了无棣县名源于县域内的河流无棣沟，这条河属于黄河支流，隋朝时逐步填埋废弃。这不仅对研究地名的演变，而且对研究黄河支流的变迁，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辩证思维是《纪要》的又一闪光点。顾祖禹虽然重视地理，但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他指出地理战略优势的发挥，也需要人的努力，不能单凭地利，所以他强调“封域不可恃为强，城郭不可恃为固，山溪不可恃为险”。同时，自然地理的高下险易虽然是固定的，但是战争一旦发动，敌我形势却是不确定的，“州域之建置有定，而形势之变动无方”。人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发挥地理的优势。

